



著名中年语言学家

自 选 集

Z M Z N Y Y X J

Z X J

著名中年语言学家

自 选 集

Z M Z N Y Y X J

Z X J

著名中年语言学家

自 选 集

Z M Z N Y Y X J

Z X J

著名中年语言学家

自 选 集

Z M Z N Y Y X J

Z X J

著名中年语言学家自选集

潘 悟 云
卷



安徽教育出版社

ZHUMING ZHONGNIAN YUYANXUEJIA ZIXUANJI

著名中年语言学家自选集

潘 悟 云

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著名中年语言学家自选集·潘悟云卷/潘悟云著.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4
ISBN 7-5336-2863-2

I. 著... II. 潘... III. ①汉语—语言学—文集
②潘悟云—文集 IV. H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19055 号

责任编辑:姚莉 装帧设计:包云鸿 马芳
出版发行:安徽教育出版社(合肥市跃进路1号)
网 址:<http://www.ahep.com.cn>
经 销:新华书店
排 版:安徽飞腾彩色制版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合肥远东印刷厂
开 本:880×1230 1/32
印 张:12
字 数:280 000
版 次:2002年12月第1版 2002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 数:2 000
定 价:23.00元

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电 话:(0551)2651321 邮 编:230061

缘 起

1993年,河南教育出版社在吕叔湘等先生的指导下编辑出版了《著名中年语言学家自选集》。这套丛书面世后得到学术界的广泛好评,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反响。

如今七年过去了,当年入选《自选集》的作者正逐渐步入老年,而新的一批功底扎实、卓有建树的中年语言学家又不断涌现出来。有鉴于此,安徽教育出版社征询了语言学界一些学者的意见,拟继续编辑出版《著名中年语言学家自选集》,以进一步推动我国语言学研究的发 展。

这套丛书编辑工作始于1999年。是年3月,安徽教育出版社的有关编辑专程进京和中国社科院语言所相关学者商谈《自选集》的编辑体例、运作规程以及有关细节,并商定由中国社科院语言所吴福祥和安徽教育出版社万直纯、姚莉三位组成《自选集》编辑小组。为确保这套丛书的学术性和权威性,编辑组特别聘请了郭锡良等16位资深著名语言学家做这套丛书的学术指导,并通过各种渠道,广泛征求、听取了语言学界不同年龄层次的学者的建议和意见。

同年5月,编辑组在充分调查研究和反复征求意见的基础上,确定了《自选集》入选对象的条件和依据:

1. 主要从事汉语(包括汉字)研究或者与汉语相关的语言理论研究。
2. 在特定的研究领域里做出突出贡献并在语言学界具有一定影响。

3. 年龄在 45~60 岁之间,工作单位限于中国大陆地区的高校或科研机构。

4. 适当兼顾学科、研究领域的代表性。

根据上述条件,经过反复酝酿、讨论,编辑组拟出一份仅供咨询、参考的候选名单,分别寄呈各位学术指导,请他们以在候选名单上画圈的方式推荐《自选集》的作者。

最后,根据担任本丛书学术指导的 16 位资深著名语言学家的推荐意见,编辑组按得票数排出了被推荐人的名次。其中前十位被推荐者是:江蓝生、马庆株、沈家煊、唐钰明、项楚、潘悟云、李家浩、游汝杰、张振兴、邵敬敏。

这套《自选集》能够顺利编辑出版,首先要感谢担任本丛书学术指导的 16 位资深著名语言学家。他们对本丛书编辑工作所给予的悉心指导和大力支持,体现了老一代语言学家对中年语言学家的热情扶植和对汉语语言学事业的挚爱。

我们还要特别感谢中国社科院副院长、《自选集》作者之一江蓝生教授为本丛书的编辑工作所付出的劳动。江先生从选题的策划论证、编辑体例的确定直到稿件的审读都给编辑组以具体的指导和帮助。事实上,在本丛书编辑工作之初,江先生是以主编的身份参加编辑组的具体工作的,只是后来得知自己被学术指导推荐为《自选集》作者之一时,才再三要求辞去主编之职。编辑组经过认真考虑觉得应该尊重江先生的意愿。

我们也应该感谢《自选集》的诸位作者,他们愿意把自己学术成果的精华交由我们编辑出版,这是对我们的莫大信任。

我们缺少编辑这样一套丛书的经验,错误和不当之处尚请专家和读者指正。

《著名中年语言学家自选集》编辑组

2001 年 12 月

作者简介

潘悟云,男,浙江省瑞安市人,1943年3月出生。1982年获复旦大学文学硕士学位,1983年至1993年任教于浙江温州师范学院,1986年被评为副教授,1991年被评为教授。1993年调上海师范大学工作,同年被评为现代汉语博士生导师,并任该博士点负责人,1995年任上海市教委重点学科“应用语言学”负责人,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上海师范大学语言研究所所长。1999年任上海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社联)副主席,上海社联语言研究中心主任。同年,上海师范大学建立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流动站,出任流动站负责人。1986年以后多次应美国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威斯康辛大学、挪威奥斯陆大学、香港城市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科技大学的邀请讲学、研究和学术访问。

潘悟云的研究工作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上古汉语历史音韵。

1. 指出上古汉语也像某些现代亚洲南方语言一样具有次要音节类型,从而对 Bodman 关于中古来母的上古来源 *C-r>r-作出语音解释:其中的 C-是次要音节。同时更进一步把这种构拟推广到与舌根音谐声的以母。2. 指出中古定母按谐声关系分两类,其中不与端母谐声一类与以母一样都来自 *l,*l-在短元音前变中古的以母,在长元音前变中古的定母,并对之作出语音解释。3. 指出上古存在小舌塞音,它们分别变作中古的影、晓、匣、云。匣母有两个来源,一个来自舌根浊塞音,一个来自小舌浊塞音。4. 对

上古收-p、-m 诸韵部进行再分部,并提出明确的分部标准。5. 指出谐声关系是上古汉语的形态反映,特别指出上古汉语通过清浊交替,带-s 后缀和 s-前缀实现使动和自动范畴的变化。上古汉语的形态在很大程度上反映语用现象。

他还翻译了几部上古音研究领域最重要的著作,一本是他主持翻译的高本汉的《修订汉文典》(*Grammata Serica Recansa*),一本是包拟古的《原始汉语与汉藏语》(*Proto-Chinese and Sino-Tibetan*),一本是蒲立本的《上古汉语的辅音系统》(*The consonantal system of Old Chinese*)。

他在上古音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接受近年来人类学关于东亚现代人来自非洲的学说,认为东亚各语言都是同源的,因而要重新认识以前对东亚语言的谱系分类。出于这种语言史观,把汉藏历史比较的视野从传统的与藏缅语的比较扩展到与侗台、苗瑶、南岛、南亚诸语言的比较,在更长的时间和更广的空间上观察东亚语言的演变历史。

二、中古汉语历史音韵。

他认为应该在反切行为的研究基础上确定汉语中古音的基本框架,并提出三条基本的反切原则。与前人不同的是,他认为反切下字反映的是韵,而不是韵母的信息。介音信息既反映于反切上字,也反映于反切下字,而且至少反映于其中的一个。由这些原则他得出推论:1. 《切韵》的每一个韵目带有相同的主元音和韵尾,根据这条推论对前人拟作同一主元音的登~蒸、哈~灰、痕~魂等韵的构拟作出修正;2. 重组两类是介音不同,并对重组的介音作出新的构拟。

三、汉语方言学。

他认为南方方言形成的主体是南方土著,他们在汉文化的影响下,学习汉语,形成一种带有本族母语特征的混合语,以后通过

双语的中间阶段,逐渐放弃了自己的母语,这种混合语性质的汉语就是汉语南方方言。根据这种语言史观,他指出汉语方言史的研究必须在作历史层次分析的基础上才能运用西方的历史比较法,同时主张以各个历史层次面貌的构拟来取代原始语的构拟。他所发表的汉语方言的论文,如《温处方言和闽语》、《‘因’所反映的吴语历史层次》、《释侬》、《浙南吴语与闽语中鱼韵的历史层次》都是用历史层次分析法来解释以往方言史观所不能解释的方言现象。

目 录

汉越语和《切韵》唇音字	(1)
中古汉语方言中的鱼和虞	(39)
上古汉语使动词的屈折形式	(52)
温、处方言和闽语	(69)
“囡”所反映的吴语历史层次	(111)
对华澳语系假说的若干支持材料	(127)
温州方言的体和貌	(181)
喉音考	(210)
吴语的指代词	(240)
缅甸文元音的转写	(282)
上古指代词的强调式和弱化式	(293)
流音考	(312)
反切行为与反切原则	(344)
作者论著目录	(369)
跋	(373)

汉越语和《切韵》唇音字^①

一 汉越语中的《切韵》唇音字

汉武帝元鼎六年，平越南北部置九郡，统称交州。大约那个时候起，就有一些汉语借词进入越南语。唐初置安南都护府，在越南设立学校，教授汉字，推行科举制度。此后，汉语才大批地、有系统地、为越语所借用。我们这里讨论的汉越语(Sino-Annamese)就是指唐代进入越南的汉语借词。这种借词所代表的音系跟《切韵》音系基本上是对应的。这个重要的特点很为语言学家所重视。从马伯乐(Maspéro)开始，“汉越语”就一直是研究《切韵》音系的重要材料。

《切韵》中的唇音声母在现代汉语方言中基本上都分化成为轻唇、重唇两类。但是在汉越语中除了唇齿音以外，双唇音中又分化出一个分支——舌尖塞音或擦音。例如：

1. f : 夫敷风發弗福方反分妃；披黻丕品愎黻。

v : 武勿亡萬文尾。

2. b : 碑被悲备贫斌变冰病平。

m : 靡眉悯密免庙命。

① 本文与学友朱晓农合写。

3. t :卑比蔽宾必鞭並僻。

th:屁匹偏篇。

z :彌袂民面灭妙名^①。

这个唇音舌齿化的现象(p、b>t, ph>th, m>z)很早就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但是长期以来一直没有人作出满意的解释。显然,这个问题不单单是属于越语语音学的范围,而且跟《切韵》音系的性质问题紧紧联系在一起。比如:唇音声母的开合问题、重组问题、三等韵介音的性质问题、轻唇化的条件问题,等等。

本文试图把《切韵》中的这几个问题跟汉越语中的唇音舌齿化现象放在一起加以全盘考虑,作出一个首尾相贯的解释。我们在写作过程中多次得到吴文祺师和濮之珍师的教益,谨此表示衷心感谢。

最早提到汉越语中这个问题的是马伯乐,他在 *Etudes sur la phonétique historique de la langue annamite*.^②一文中提出:“在大部分场合,汉语的 p 和 b 在汉越语中由 b 代表,在小部分词中, b 变为 t”(p. 37)

后来,高本汉在他的 *Etudes sur la phonologie chinoise*^③ 一书中也对这个唇音舌齿化现象作了论述,并对它的分化条件试图作出解释。他说:汉越语中“近古汉语的 p 和 b 照例是用 b 译的,可是也有些个 t。——同样 ph 也有时候拿 th、t 来代表。这个 t、th 只在开口三四等里出现。这是在安南境内发生的一种变化。它在语音上的理由到现在还不明白。”(*phonologie* pp. 420~421)下

① 本文的越语标音除越南地名外,都采用国际音标。

② 原文载 *Bulletin de l'E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 Orient*, 12:1~127。下面引到该文时,简称 *phon. ann.*

③ 本文参考的是中译本《中国音韵学研究》,赵元任、罗常培、李方桂合译。下面引证此书时简称 *phonologie*。

面,他在提到汉越语中用 *z* 来代表中古汉语 *m* 的时候又说:这个“条件恰好跟用 *t* 代 *p*、用 *th* 代 *ph* 的条件相同——就是在 *i* 的前头而不是合口的时候。”(*phonologie* pp. 435~436)

1948年,王力先生发表了《汉越语研究》,对高本汉的上述观点作了进一步的论述,使之明确化了。王力先生说:“大致看来,帮並两母的例外字混入精从两母,作 *t*;滂母混入清母,作 *th*;明母混入喻四,作 *z*……唇和齿,在音理上讲,颇难相通,所以这一类的事实甚饶兴趣;尤其是轻唇音(唇齿)倒反不和齿音相通(见下文),更为奇特。滂非敷奉四母皆读 *f* 音,独滂母字有读 *th* 的,最值得注意的是。重唇音开口三四等字,大多数读入变音,这是显而易见的。我们可以说:开口细音中有不读变音的,但变音中几乎都是开口细音,只有‘婢’、‘避’、‘面’、‘滅’几个字是例外,或者它们是高本汉所谓的‘假合口’。总之,我们可以从多方面证明开合口的分立。例如‘名’开而‘明’合,则有 *zan* 与 *min* 之分;‘酪’开而‘命’合,则有 *zan* 与 *men* 之分;‘辟’开而‘碧’合,则有 *tiɬ* 与 *biek* 之分,‘鞭’开而‘变’合,则有 *thien* 与 *bien* 之分。再看轻唇音因为只有合口字,没有开口字的缘故,就完全没有变音。由此看来,在音理上我们虽不能满意地说明它们是‘如何变的’,但在事实上我们总算能证明它们在什么条件之下发生了变化的了。”

对高本汉和王力先生的观点,我们有下述的补充或不同看法:

①在汉越语中变为舌齿音的原《切韵》唇音字是大批的,不是个别的(例字在后文表中列出),它们的变化完全符合越语的语音演变规律。我们不能认为这是例外现象。

②变作舌齿音的这类唇音字中,只有细音(三四等字)没有洪音,这是高本汉和王力先生所发现的,也是他们在解释这个现象时的主要贡献。不过必须补充一点:这类细音包括三等,而不包括纯四等(当然,其中有个别例外字)。

以上两点在后文例字表中可得到证明,毋须赘言。

③开合口并不能作为重唇音在汉越语中分化为两支的条件。理由很简单:《切韵》系统中唇音根本不分开合。

关于唇音不分开合的结论,已经有学者作过详细的论证,但是毕竟还没有得到语言学界的普遍承认。此外,还有一些有关的问题也未能加以妥善的回答。所以,在讨论汉越语中的《切韵》唇音声母前,必须先对唇音字的开合问题作一详细的讨论。

二 《切韵》唇音声母的开合问题

唇音分开合的明确提法首先见于宋人韵图。但是在宋人韵图里,唇音的开合分法非常混乱。粗略地说,跟《切韵》音系非常接近的《七音略》、《韵镜》^①中,唇音字大多列为开口。而在以后的《切韵指掌图》、《经史正音切韵指南》等韵图中,绝大部分唇音字归到合口里去了。从此,唇音的开合问题就成了一场打不清的官司,各有各的分法。

后来,Volpicelli 认为《切韵》三等韵中,轻唇化了的都是合口,仍然保持重唇的都是开口(见 *phonologie*, p. 37)。这实际上给唇音声母的开合口的划分定下了一条明确的标准。

这个假设为 Schannk、马伯乐等人所接受。特别是高本汉在 *phonologie* 中把它肯定下来之后,唇音分开合,轻唇化条件是合口三等就成了两条不可动摇的铁律,一直到今天还在汉语学界有着深刻的影响。

① 根据罗常培《释轻重》(收于《罗常培语言学论文选集》,北京,1963)中的说法,《七音略》中的“重”、“轻”与“开”、“合”相当,又《韵镜》的开合与《七音略》的开合一致,故下面我们只举《七音略》为例。

王力先生在他的《上古韵母系统研究》中更把这条标准同谐声系统联系起来。于是不但三等唇音字,连一二四等的唇音字也都有了划分开合的标准。他的办法是这样的:“凡谐声偏旁,或者所谐之字,后世变入轻唇音者,在上古即属合口呼;或谐声偏旁,或其所谐之字,完全与后世轻唇绝缘者,在上古即属开口呼。”

这么一来,唇音分开合的标准在理论上已是完美无缺了,但是,一旦接触到实际语言材料,立刻就显得漏洞百出。下面我们仅仅提出八个问题,这些问题都是唇音分开合说所不能解答的。

第一,《切韵》中为什么同一个唇音字既能作开口字的反切下字,又能作合口字的反切下字(如“蟹”开口字,鞞买反,“拐”合口字,孤买反)^①?为什么同一个韵里,甚至是同一呼中的唇音字,有些用合口字作反切下字,有些却用开口字(如同是开口唐韵的“滂”普郎反,郎开口;“傍”步光反,光合口)?既然唇音分开合,那么它们的切语用字为什么却开合混用?

第二,《广韵》中合口桓、戈,明明已经与开口寒、歌分韵,可是归到合口去的唇音字的反切下字有些却用开口字,如:“伴”蒲旱切,“满”莫旱切,等等,这该如何解释?

第三,为什么各家韵图对唇音字开合口的归类竟会有如此大的区别?难道《七音略》、《韵镜》中的开口唇音字到《切韵指掌图》时代,突然变为合口字了?现代方言中唇音基本上属于开口,难道《切韵指掌图》时代变作合口了的唇音字到现代又重新变回到开口去?

第四,阳、东_三、尤三个韵的唇音字后来都轻唇化了,但是在

① 本文中的切语,如注明是××反,都引自宋跋本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如注明是××切,都引自《广韵》(本文采用周祖谟《广韵校本》)。凡引自《切韵》残卷的切语,另加注明。

《七音略》、《韵镜》中为什么列为开口？

第五，“永”字切“丙、皿”，“殒”字切“愍”，“为”字切“糜”，“兗”字切“緬”，“荣”字切“兵”，反切下字“永殒为兗荣”都为合口字，那么按照反切规则，它们的被切字都应该是合口三等字，但是它们为什么没有轻唇化呢？

第六，有些三等重唇音字跟轻唇音字谐声，如“悲”谐“非”，“丕”谐“否”，“免”谐“晚”，“鄴”谐“费”，“敏”谐“侮”，“邠”谐“分”，“沕”谐“勿”，等等。照王力先生的谐声系联方法，它们当然都属于合口字，但是它们为什么不轻唇化呢？

第七，我们按照王力先生的谐声系联方法，在《上古韵母系统研究》一文中所拟定的音韵系统和收字范围内，进行了一次统计，发现唇音声母跟韵母的配合情况如下表：

上古韵部		之蒸	幽	宵	侯东	鱼阳	歌曷寒	支耕	微諄	脂质真	侵緝
唇音字数	开	2	14	22	0	20	24	25	0	52	0
唇音字数	合	45	25	0	35	51	58	0	66	0	6

王先生拟定的十个韵部中，倒有六个是唇音没有开合对立的。为什么微部只有 puəi 而没有 pəi？为什么支部只有 pe 而没有 pue^①？其余四个韵部之蒸、幽、鱼阳、歌曷寒，合口字有 179 字，开口只有 60 字，相差竟如此悬殊。我们知道，汉语以至汉藏系语合口字远比开口字来得少，而且声韵配合很匀称，如果出现一个带有 u 介音的合口韵，一般说来总有一个开口韵与之对应。根据王先生的开合理论所得到的上述结果，实在难以用音理加以解释。（这样的声韵分布：脂支宵只有开，侯微侵只有合，倒使人产生一种想

① 微、支部拟音根据王力《同源字论》，载《中国语文》1978 年第 1 期。

法,轻唇化的原因也许不是合口,而是韵母。后文将详细论证这个假设。)更有意思的,王力先生为了解释汉越语中唇音字的分化条件,说“明、命”是合口字(见上文),而在《上古韵母系统研究》中为了迁就他的谐声系联方法,又把“明、命”归为开口,自己跟自己打起架来了。

第八,王力先生在给唇音字归开合口的时候,碰到了一个困难:有些汉字跟轻唇音在谐声上系联不起来。于是王先生又定下了一条补充的办法:凡是跟轻唇音假借者为合口,不能假借者为开口。王先生在注解中说的所谓跟轻唇绝缘者不但谐声不同,假借也不相同,就是这个意思。因为唇音分开合纯粹是人为的,所以必定会与实际的语言材料发生抵触。王力先生的谐声系联办法跟假借办法之间也同样地发生打架现象。略举数例。

1. “包”,王先生定为开口,从“包”得声的都应是开口。但是“伏羲氏”之“伏”《易·系辞下》作“包”,《汉书·律历志》作“炮”,《列子》作“庖”。“伏”轻唇音,合口。又,《左传·隐公八年》“公及莒人盟于浮来”,《谷梁传》作“包来”,“浮”轻唇音。

2. “皮”,王先生定为开口。《仪礼·乡射礼》:“君国中射则皮树中。”郑氏注:“今文皮树为繁竖”,“繁”轻唇音。又《汉书·古今人表》司徒皮,《毛诗》作“番”,轻唇音。

3. “波”,王先生定为开口。《书·禹贡》“荦波既猪”,《释文》马本作“播”,“播”之声旁“番”是轻唇音。

4. “裒”,王先生定为开口字。《释文·尔雅音义》“裒古字作褒,本或作桴”。“桴”之声旁“孚”为轻唇音。

同样的例子我们还可以举出好多。

从上面八点看来,高本汉等人给唇音定出的开合标准是不能自圆其说的,而且,给唇音定开合的任何企图最终只能自造麻烦。高本汉本人也看到了这些麻烦,所以想出了一个很聪明的办法来

自我解救。他说古代的唇音是噉着嘴说的,即所谓假合口,所以听觉上往往跟真合口相混。我们知道,只要是两个相对立的音位,不管它们在音色上如何接近,操这种语言的人是分得一清二楚的,决不会在反切、韵图上弄得如此一团糟。如果连写韵书、韵图的人也往往把开合搞混起来,那么唇音的开合是否作为两个对立的音位存在实在令人怀疑了。何况在汉语方言中,乃至汉藏系语言中实在难以找到一处噉着嘴发唇音的方言为高本汉作证。所有这些问题都迫使我们作另外的设想:是不是《切韵》唇音字压根儿就不分开合呢?

黄淬伯先生《慧琳一切经音义反切考》通过切语系联,在开合之外又立唇音一类,实际上已经对传统的“唇音分开合”的说法提出挑战。1941年,赵元任先生发表了 *Distinctive and Non-Distinctive Distinctions in Ancient Chinese*^① 一文,从汉语语音中的辨字特征出发,证明唇音没有开合的对立。1948年,李荣先生在《切韵音系》一书中,利用故宫本王韵的切语材料,证明了唇音无开合对立。赵元任等先生所做的工作很有说服力,这里不再重复引述。不过还有三个问题需要进一步讨论。如果它们得不到妥善解决,那么就会给“唇音无开合对立”的说法,留下很大的漏洞,从而大大削弱了它的理论力量。

第一个问题是:如何处理哈灰两韵中的唇音字对立。下面是宋跋本王韵的例子:

① 载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第五卷第三第四分合刊, pp. 203~233, 1941。原文题目误作 *Distionctions within Ancient Chinese*, 今据《切韵音系》(李荣)所据油印本更正表改。下文引到此文时简称 *Distinctions*。